

新時期對美國對華人權策略之應對

左 權*

眾所周知，在人權保障方面，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都存在需要進一步改善的地方。正如《2011年美國的人權記錄》所揭示的，美國自身有很多人權問題。如暴力犯罪嚴重，槍支泛濫，公民的生命、財產和人身安全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侵犯隱私，警察濫施暴力，失業率居高不下，醫療保障缺失，貧困人口、無家可歸者激增，種族歧視普遍，等等。與現代化進程相伴，中國人權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進步和發展，中國的人權狀況處於歷史最好時期，這是不容抹殺的成就。中國堅持以人為本，將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首位，在改革、發展、穩定的良性互動中全面推進人權，促進公民、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以及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的協調發展，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同時，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人口眾多、區域差異大、發展不平衡，面臨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務仍然十分繁重，在人權保障上仍存在許多問題和不足，發展人權事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然而，面對中美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諸多分歧，美國政府長期對中國人權實施雙重標準，把人權作為打壓、遏制中國的政治工具，美國對華人權策略已成爲人權政治化的典型代表。由此，筆者以中美兩國人權交鋒爲焦點，尋求解答美國對華人權策略的根源，這種人權策略帶來了哪些危害，在新時期中國應當採取何種措施應對等問題，以期能夠爲化解中美之間的人權“死結”尋求一種可能路徑。

一、美國對華人權策略的國內動因

美國是對華人權外交政策最“堅定”的執行者，曾連續多年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¹上提出反華提

案，屢敗屢戰，屢戰屢敗。² 美國國務院每年發表的《國別人權報告》中國部分，充滿了對中國的指責。如果說美國的普通人由於美國國內媒體的歪曲報道，不能理解中國的人權觀念和人權保障道路的話，那麼說美國的政治家也不瞭解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未免幼稚了。美國對華人權策略背後有着深厚的理論基礎、宗教因素、廣泛的社會支持、現實的政治環境和長遠的戰略利益。

(一) 美國式人權觀與宗教因素

歐洲啓蒙運動對美國的政治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人本主義者宣揚人的自然屬性、人格尊嚴、個人價值，使得關於平等、自由、追求幸福的觀念得以伸張和普及；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思想家提出的三權分立、社會契約、天賦人權和政治自由等理論，爲美國的獨立和建國做了充分的思想動員和理論準備。美國《獨立宣言》明確提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爲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但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富蘭克林、傑弗遜、漢密爾頓等建國先賢們不僅著書立說倡導個人自由、民主、天賦人權等思想理念而且付諸於政治實踐，這些原則不僅成爲美國立國信條，也爲美國式人權觀奠定了思想基礎。“美國式的‘自由主義’人權理論是以‘個人主義’爲核心內容，以古典自然權利理論爲淵源，兼收新自然法學以道德哲學爲基礎的權利觀，立基於社會的獨立個人與國家二元對抗的英國憲政主義傳統的權利論”。³ 美國式人權觀以人的自然權利爲依據，認爲自由是個人生活領域的至高價

* 東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值，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權優先。人權是與生俱來的、不可剝奪的且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人權(主要是自由權、政治權利)是普遍的、永恆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人權法案》主要目的就是保護公民的自由權。正如路易斯·亨金指出的：“美國在人權方面，特別是在平等權利和經濟社會權利方面所承擔的義務，低於當代國際水平，這是美國人權保護制度的‘遺傳的缺陷’”。⁴ 美國逐漸形成了只強調自由權等公民、政治權利，而輕視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權利的人權觀。美國至今未加入《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國際人權公約。吊詭的是，美國不但不接受國際人權標準，還強迫他國接受美國式人權觀。

美國的人權策略也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可以說，美國是因為宗教而建立的國家，清教徒的精神和信念深深地烙印在美國的思想文化中。清教徒為了逃避宗教迫害，懷揣着尋找人間樂土的希望與夢想，於1620年乘坐“五月花號”登陸馬薩諸薩州，為美國這個移民國家打下了基礎。美國人認為自己是負有神聖使命的“上帝選民”，要拯救其他受苦受難的人民；美國作為“山巔之城”代表着進步和未來，是世界最好的社會模式。這種以自信、富於冒險和濃厚的宗教情結為特徵的國民特性和政治理想，深深影響着美國的價值觀念和對外政策。美國外交政策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強調外交的主要目標是維護正義和全世界的民主化和進步，主張通過美國參與國際組織、自由貿易，提倡人權和民主，建立一個自由公正的國際社會。⁵ 美國認為在維護和擴大其民主、自由等價值和制度影響的同時，也擴大和維護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物質利益。因此，向全世界推廣包括人權在內的美國的道德、價值觀念和民主制度就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使命。明確提出和推行“人權外交”始自卡特政府，此後的歷屆政府都延續這一政策，人權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

(二) 美國社會結構和政治現實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總人口的80%左右，是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美國擁有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貧困綫以下的人口都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生活無憂。因此，雖然根據他們的標準(美國貧困標準是一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低於22,314美元)美國也有不少貧困人口(約佔總人口的15.3%)，但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美國人不存在絕對意義

上的生存權問題。這樣的社會結構，加上美國式人權傳統觀念，美國人尤其關注言論、出版、結社、宗教等自由權。一些政客為了滿足這部分人的人權偏好，就以政治制度劃綫，將指責一些“非民主”國家的人權作為重要的政治議題。這樣，歷史文化、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迥異的中國自然首當其衝。

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顛覆中國政權的圖謀“路人皆知”。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是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的主導者。如今，中國經濟增長迅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着越來越重要上的作用，中國的和平崛起在一些美國人眼裏似乎已經形成了對美國單極霸權的直接威脅和挑戰，遏制中國這個“戰略對手”已經勢在必行。於是，政客們不遺餘力地尋找批評中國的元素，而“人權牌”就是一個重要棋子。一方面，他們可以想當然地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居高臨下、頤指氣使，通過批評、貶低中國人權，來宣揚和“維護”美國的價值觀，尋求一種身份認同與“自豪感”；另一方面，他們標榜自己“美國式人權觀”代言人的身份，能夠去代表和維護選民的人權需求，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和政治利益。美國大打“人權牌”，既有對中國崛起的“防範意識”，更有無法撼動中國穩定、無力阻止中國崛起的無奈與焦躁，而充斥美國各大新聞媒體的對中國的負面報道，正好為美國政客提供了攻擊中國的口實。這就是美國國內推動對華人權“國家”戰略的動力所在和現實環境。

二、美國對華人權策略的危害

二十多年來，人權問題始終是困擾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制約因素，成為中美衝突的一個“導火索”。美國對華實施人權策略不僅嚴重阻礙了兩國之間正常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交往，而且給中國在多方面帶來了危害。美國對華人權策略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利用聯合國人權平台，一次次提出反華提案；二是美國國務院在每年發佈的《國別人權報告》中以大篇幅指責中國人權，戴着有色眼鏡將中國人權狀況描繪得一無是處；三是在雙邊外交中，美國拋出所謂“中國人權問題”已成為常規動作，給中國政府製造各種壓力；四是包括總統在內的美國政府官員，在國際、國內的公開場合(如公共演講、競選演說、記者會)，直接攻擊或影射中國人權，對中國人權說三道四。

（一）美國對華人權策略嚴重侵蝕中國的人權話語權

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人權與和平、發展並列，被公認為聯合國的三大支柱，人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話語。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人權的各種指責使中國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如果不加以有力的回應，就會被世界各國甚至會被中國人民認為，中國政府默認了美國的指責；如果採取了針鋒相對的回應方式，就避免不了對美國反唇相譏，以指責反擊指責，儼然成爲了一場“人權鬧劇”，這與中國長期堅持的要對話不要對抗、反對人權政治化、尊重各國人權特殊性的立場相抵觸。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從1997年開始發佈《美國的人權紀錄》，向世界揭示美國人權狀況的真實面目，不僅是爲了刺痛美國，使其也承受壓力，更是爲了奪取人權話語權不得已的選擇。儘管《美國的人權紀錄》是一個很客觀的記錄風格，所有資料都來源於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對美國人權狀況所做的一些實證的研究、統計以及新聞媒體一些經過證實的報告。但這種方式很難說起到了正面消解美國對華人權批判的作用，反制效果並不理想。一是美國指責中國人權並沒有因此而有所顧忌；二是國際主流媒體認爲中國對美國對華人權策略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⁶目前，美強中弱、美攻中守是中美人權交鋒的總體形勢，中國被局限在美國給出的話語框架內討論問題。在國際上，不僅中國政府的國際人權話語權受到壓制，中國對中國人權的話語主導權也正被嚴重侵蝕。

（二）美國對華人權策略損害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際聲譽

在人權日益主流化的今天，一國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權、國內人權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其國家形象與國際聲譽，也關係到該國的政府行爲是否爲國際社會所接納。美國過去每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拋出反華議案之前，都要到處散發美國的人權報告(中國部分)作爲鋪墊，並派人到處遊說，大造反華輿論；在會議過程中，美國代表團團長帶頭發言詆毀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拉攏其他一些國家發言附和；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經常採取威逼利誘手段，要求他們支持美國一致譴責中國。《國別人權報告》對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視而不見，對中國人權狀況全面抹黑。如2011年人權報告用142頁的篇幅對中國人權評頭論足，在論及中國(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門)人權狀況時，開頭便指中國爲“獨裁國家”，稱在主要領域人權形勢繼

續惡化，而對於人權顯著改善的方面則加以“選擇性的忽視”，把中國描述成一個長期壓制人權的國家。該報告的很多資料不是來源於正式統計數據或者正式的報道，而是據估計或者是一些未經證實的信息，論斷充滿了主觀性和武斷性。在這份人權報告發佈後，華盛頓郵報、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均發表相關報道，亦稱中國人權狀況惡化。這種基於政治和意識形態偏見而非從人權發展的基本事實中得出的結論，任何一個正在努力推進人權建設並不斷取得人權進步的國家和人民對此都不能接受。俄羅斯、委內瑞拉和烏克蘭政府、專家都批評或譴責美國人權政治化和以人權干涉別國內政的做法。⁷由於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超級大國”地位，其無端指責中國人權狀況，刻意抹殺中國人權事業的進步，妖魔化中國的國家形象，必然會產生惡劣的國際影響。與美國在政治制度、價值觀相近的一些西方國家要麼也發佈類似的中國人權報告，要麼緊隨美國對中國人權問題進行橫加指責，引發一陣全球範圍內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和“批評”。

（三）美國對華人權策略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穩定與經濟社會發展是皮與毛的關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國國民對國家和政府的認同度不僅影響直接國民的凝聚力、社會動員能力，而且影響社會穩定。美國的人權策略具有極大的政治隱蔽性、迷惑性，常常用來破壞、分化、瓦解其認爲是“非民主”國家的國民凝聚力，從而大大削弱了該國政府的政治、文化動員能力。美國的人權外交策略僅僅強調自由權等政治權利，通過種種渲染、外交辭令或者暗地資助反政府組織，加之在被標榜爲“言論自由載體”的社交網絡媒體上的迅速擴散，分化那些認同美國人權觀的群體(主要是衣食無憂的高收入階層、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群體、青年學生等)，挑起他國政治精英、富裕階層與貧窮階層、普通民眾，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的矛盾和衝突。這些國家政府如果不能及時應對，往往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民眾被分化瓦解，將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主導權拱手讓給了美國。由於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在其鼓動、挑唆的人權外交策略的“引導”下，一些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的國家裏，在任何一個偶發事件的刺激下，就足以引發嚴重的、難以調和的社會衝突、族群撕裂，甚至大範圍的種族、宗教衝突、反政府活動而影響社會穩定、國家動盪乃至政權更迭，從而帶來美

國希望看到的混亂的“民主進程”。這種手段屢試不爽，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格魯吉亞、烏克蘭的“顏色革命”、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相繼爆發的“茉莉花革命”等，背後都有着美國人權外交的黑手。我們看到革命後這些國家民眾的生活並未得到改善，而代價是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和人道主義危機。“橙色革命”前的2004年，烏克蘭經濟速度率為12.1%，而“革命”後的2005年經濟增長萎縮為2.8%，從此經濟一蹶不振。⁸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人權策略就是以製造對手國內混亂的方式達到控制對手的目的，美國人權策略又是美國的大戰略。可以說，中國與美國的人權交鋒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戰爭。只要中國不斷發展壯大，只要中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道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就會利用人權問題指責和攻擊中國，以壓促變，破壞中國穩定大局，干擾經濟社會發展秩序，我們要時刻警惕西方國家以人權為工具西化、分化中國乃至顛覆中國政權的圖謀。

三、對美國人權策略的理性反思與應對措施

中美兩國在歷史文化傳統、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階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異，在人權領域存在着諸多分歧。由於美國國內政治勢力和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美國政府不會放棄或軟化對中國人權問題上的立場，對中國人權的攻擊也不會停息。人權問題猶如懸掛在兩國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成為困擾着兩國關係健康發展的不穩定因素，人權死結如鯁在噎。面對美國的人權策略，一方面我們要“以我為主”，更加堅定地走人權保障的中國道路；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加強防範，採取相應措施，化解各種危害和風險。

(一) 堅定不移地走人權保障的中國道路

世界文明的發展和豐富多彩源於各民族、各國家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在人權領域也是如此。美國副總統拜登於2011年8月21日在四川大學發表演講時聲稱“中美最大分歧是人權”，這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中國政府在1991年發佈的第一份人權白皮書——《中國人權狀況》中就鄭重聲明：“人權”是個偉大的名詞，享有充分的人權是全人類追求的理想，也是中國政府和人民長期為之奮鬥的崇高目標。中國承認人權的普遍性，只是由於對人權的理解、人權的實現方式、人權保障戰略的制定和實施與西方國家有着差

別而已。這符合現代世界多元文明的特徵，即便是在歐美等西方國家，人權保障模式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區別。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在中美關係的發展過程中，美國始終以美國式人權觀為“普適人權標準”，並將其作為衡量中國人權狀況的指標，這豈不可笑？美國自身存在許多人權問題(包括侵犯別國人權)而遭到世界的眾多批評，卻把自己的人權觀強加於中國，這豈不荒唐？中國作為一個東方文明古國，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中國有着自己獨特的社會主義人權觀，在人權保障上不可能照搬別國模式，只能根據中國國情，沿着自己的道路不斷探索。可喜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幾十年時間裏完成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才能完成的建設任務，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十幾億人口實現由普遍貧窮到總體小康的重大跨越，這一切都為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佐證。無論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定地沿着中國特色的人權發展道路走下去，在不斷實現人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基礎上，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進一步滿足人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同時，加強在人權理論方面的研究，構建成熟的中國特色人權理論體系，開創人權保障的“中國模式”。

(二) 充分利用中美人權對話機制

中美人權對話始於1990年，到目前為止，中美之間共舉行了16輪人權對話。儘管司長級的人權對話在中美關係的大格局裏，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但其政治指標意義頗高，中美人權對話甚至可以稱為中美兩國關係發展的晴雨表。目前兩國人權對話的議題主要包括：法治、司法改革、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反對種族歧視、勞工權益、少數人群體權益、互聯網管理、在聯合國人權領域的合作等；中國對美國人權提出的異議包括犯罪、貧窮、無家可歸和種族歧視等問題。中美人權對話既是用對話代替對抗的務實做法，也是兩國在人權領域的一個化解分歧、增進共識的溝通平台。中美兩國在人權領域的分歧，不應成為兩國開展包括人權交流與合作在內的更廣泛領域正常交往的障礙，中美兩國在追求共同利益的過程中應不斷淡化人權問題造成的阻礙和屏蔽。中美雙方要堅持“增進瞭解，縮小分歧，相互借鑒，共同進步”的16字方針，坦誠地、務實地、現實地面對兩國人權分歧，本着求同存異的態度，以平等的、相互尊重的立場，共同尋找解決方案。不僅要把中美人權對話作為兩國政府間的對話機制予以堅持和完

善，而且立法、司法等國家機構層面、民間組織層面也要廣泛地談，談比不談好，多談比少談好，在談中達成諒解，達成共識。

（三）參與國際人權事務，融入國際人權機制

近年來，中國積極開展國際人權交流與合作，在聯合國人權框架下努力推動國際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中國政府按規定提交執行有關公約情況的報告，嚴肅認真地履行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同時，中國與多個國家和國家組織開展人權對話，與各種國際性、區域性人權組織機構保持密切聯繫，增進了相互間的瞭解與信任。⁹ 目前，中國的人權觀念不斷成熟，人權的保障模式也取得了顯著成就，中國具備了參與國際人權機制中議程設置、規則制定等能力。我們知道，僅僅靠自身實力是難以實現重大政治目標的，只有運用外交因素使自身力量得到擴展和延伸。我們要進一步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人權領域的磋商與合作，承擔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人權責任，堅定地與第三世界國家一道積極倡導民族自決權、生存權、發展權、和平權等，強調人權不僅包括個人人權，而且包括集體人權，反對以人權為藉口干涉別國內政，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共同構建國際人權新秩序。

（四）反制美國人權策略的應對與反制措施

目前，夾雜着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的歧見以及台灣、西藏等問題，中美之間關於人權的交鋒越來越複雜和敏感。同時，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對於中國人權狀況的臆斷和抹黑，往往都是建立在具體個案的基礎上。由於美國國內媒體的肆意炒作，加上政客們的興風作浪，把一些個案就樹立為攻擊中國人權的靶子，並由點及面，將其上升為普遍情況，從而將中國人權狀況全面摸黑。面臨新形勢下的這些棘手問題，我們要認真加以區分，小心地應對。

一是，對於以人權為幌子，實質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台灣、西藏等問題，侵犯中國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我們應該絕不手軟，運用國內國際資源，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擊。

二是，對於那些破壞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穩定大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依法予以懲處。對於他國以人權為名，妄圖干預中國司法主權的，予以堅決回應。

三是，對於其他的一些人權事件和法律案件，要增加中國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工作的透明度。我們要

堅決貫徹落實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有關規定，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訴訟法中公開審判的原則，充分滿足公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以往，我們注重人權保障上多數人與少數人的關係，強調保障多數人和集體人權而忽視了少數人和個人權利的保障。我們要認識到，在人權保障問題上，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同樣重要，每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都應該得到尊重。針對外國新聞媒體反覆報道的個案，在不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秘密時，政府和司法機構應該及時加以澄清，作出正面、清晰的回答。只有在具體案件中體現對基本人權的充分保障，外國新聞媒體才會失去攻擊中國人權的藉口和理由。當然，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政府和司法機關在保護人權方面肯定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只要中國政府和司法機關勇敢地面對，真誠地向國際社會澄清事實真相，那麼，就會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理解。

四是，在維護中國人權形象、掌握人權話語主動權方面，政府宣傳部門和新聞媒體責無旁貸。我們要進一步加強政府人權白皮書公佈制度。從 1991 年至今，中國政府發表了四十多個有關人權的白皮書，比較全面地介紹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狀況和成就，闡述了中國發展人權的主張和道路。這些白皮書有介紹某個歷史時期中國人權狀況的，也有介紹某個年份人權發展情況的，還有介紹某個地區或領域人權保障情況的(如專門介紹西藏、新疆等具體地區的人權狀況，還有針對知識產權、計劃生育等問題的專題性白皮書和針對婦女、兒童、老年人等特殊群體權益保障的白皮書)，它們具體、動態地記錄和展現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程，全面立體的展示了中國人權的發展的進步。同時，我們要創新國際宣傳方式，引導國際輿論。新聞媒體要嚴格按照新聞規律辦事，客觀、公正、全面地向世界展現中國的人權狀況，以及中國在人權理論和實踐中取得的進步，促進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和瞭解。防止西方新聞媒體利用中國新聞媒體的報道，放大了中國的陰暗面，歪曲中國的人權事業，惡意醜化中國的人權形象。

第五，美國國會是對華人權策略的大本營。美國國會議員之所以在中國人權問題上指手畫腳、無所顧忌，就是因為他們在中國人權問題上大放厥詞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反而可以收穫政治利益。我們要通過國際議會交往等途徑，給那些惡意攻擊中國人權的國會議員以駁斥。針對美國國會議員關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錯誤言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要及時表態和批駁；中國企業界和

投資者，要防止那些肆意醜化中國的國會議員從中國撈取經濟利益。

另外，我們要更加自信，主動把握人權話語權。我們不妨有意留心一些國家的人權事件，通過恰當的外交方式予以關注和回應，表達我們對人權受害者的同情與支持。每到重大外交活動時，也可以就他們的人權問題，主動提出批評，逐步擴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的影響，建立我們在人權問題上的話語權，扭轉中國在人權外交方面的被動局面。

四、結語

我們不認為中西人權交鋒只有負面作用，它在客觀上也促進了中國對人權問題的再認識。我們也願意聽到其他國家對中國人權發展狀況的各種建議、批

評，以便在人權保障方面進一步改進並借鑒其他國際的成功經驗。然而，美國對華人權策略長期搞雙重標準，將人權作為謀取自己戰略利益、推行霸權主義的政治工具。中美人權交鋒過的實質，是遏制與反遏制，西化、分化與反西化、反分化，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美國借人權問題打壓中國的圖謀不會改變，中國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堅持走人權保障中國道路的決心也不會改變，人權問題仍將是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一大掣肘。解鈴還須繫鈴人，破解中美人權困局的關鍵在於美方。只有美國徹底摒棄一貫的傲慢做法，本着互相尊重、平等協商的態度進行對話合作，真誠地去瞭解中國的人權觀念和中國的人權保障道路，着眼於優先考慮雙邊關係良性發展的“戰略大勢”，而在人權問題等“戰術”上保持適度的政策靈活性，中美人權之爭才有望得到解決。

註釋：

- ¹ 原人權委員會由聯合國經濟和社會理事會管轄，但由於其政治化色彩強烈，遭到廣泛批評。聯合國大會於2006年3月15日通過決議，設立共有47個席位的人權理事會取代人權委員會。人權理事會作為聯合國大會的下屬機構，負責對聯合國所有成員國作出階段性人權狀況報告，理事會成員在任期內必須接受定期普遍審查機制的審查。美國因為達不到自己的目的，對人權理事會的成立投了反對票，並一度選擇不參加該理事會。直到2009年，奧巴馬政府才轉變了態度，加入了人權理事會。
- ² 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曾11次提出反華議案，2005年美國正式宣佈不再搞反華提案。自1990年至2004年的15年間，只有4年美國因為政治需要和情況變化而未提。1991年美欲攻打伊拉克，1998年因克林頓總統當年6月訪華，2002年美國在人權委員會選舉中落選，2003年在對伊拉克動武問題上有求於中國。這揭示了美國在對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進行“評估”時的“策略性”和實用主義態度，即衡量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好”與“壞”、“進步”與“退步”時，人權狀況本身並不是重要的依據和標準，真正起作用的是美國總體戰略的需要和對國家利益的考慮。
- ³ Drodny, J. D. (1999). *Originalist Just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Unenumerated Rights*. *Law Review of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
- ⁴ Henkin, L. (1979). *Rights: American and Human*. *Columbia Law Review*, (1).
- ⁵ 賈慶國：《美國外交思想與實踐》，載於《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 ⁶ 李川：《對美國策略性人權批判的化解》，載於《山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 ⁷ 《美國年度國別人權報告遭批》，載於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world/news/detail_2011_04/13/5711282_0.shtml，2011年4月13日。
- ⁸ 《橙色革命一週年的烏克蘭：經濟下滑黨派鬥爭不斷》，載於《環球時報》，2005年11月23日。
- ⁹ 2009年，中國首次接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國別人權審查，全面介紹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努力目標，現場採納有關建議。自1997年以來，中國已與歐盟進行了7次人權對話，並召開了4次人權與司法研討會。中國與英國舉行了5次人權對話，與加拿大舉行了6次人權對話和1次人權研討會。中國與挪威共同舉辦了4次司法圓桌會議。中、加、挪還於2000年6月在泰國舉辦了第三屆人權研討會。